

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在融汇诸子百家基础上，最终形成了重视人类普适性的伦理道德规范、极具民族主体意识的中国式人文关怀、激励人性和褒扬群体性的人文意识，形成了注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追求“内圣外王”的文化体系，并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习惯中。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战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既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了强大动力，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又一次淬炼迸发，从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内在生命力。

一、民为邦本的仁政思想

儒家所倡导的“民为邦本”“惠民利民”的仁政思想是“生命至上”抗疫精神的重要思想渊源。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尚书·五子之歌》里写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这个“根本”稳固了，国家方能实现安宁。儒家提倡“仁政”，以百姓为国本，以道德为政治的根本纲领。孔子主张以仁德施惠于民众，孟子主张“仁政”，荀子主张“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突出了“民为邦本”之意。程颢深化了“仁政”思想，认为君主的责任就是为百姓的生活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养民富民。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的思想，他认为，历史上的贤明君主之所以能够取得

天下，是因为懂得取得人心的道理。宋代朱熹认为，“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民，田野之心，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就是说，民众的利益和诉求高于一切，是最为重要的。得乎民，则可以以为天子；而得乎天子，最多只可为诸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提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举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他认为，古代民贵君轻，君王一生努力是为天下，古代的根本思想要义在于要切实关注民众的利益诉求，有民才有国，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汲取“君子喻于义”的义利观，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的“义”，自成立之始，就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奋斗的出发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全面部署、依法、科学、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保障了人民生产生活。“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做法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也是儒家倡导为政以德、以民为本的最好体现。

抗疫精神的儒家文化底蕴

□ 郝良华 曲晓萌

二、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举国同心、舍生忘死抗疫精神的思想来源。儒家倡导“天下一体”和家国同构，以“忠孝一体”为价值导向，高扬经邦济世的社会实践方式，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成为中华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担当意识在一次次民族危难之时，均是来自人民群众灵魂深处的呐喊，振聋发聩，唤人奋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强调“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亿万人民迸发出炽热深沉的家国情怀，风雨同舟，众志成城，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医务工作者舍小家为大家，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将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

连，舍生忘死，勇于担当，甘于奉献，谱写出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抗疫精神所体现的中国人民舍生忘死的家国情怀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主题，是民族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

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中华民族秉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精神，是其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虽历经磨难却得以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抗击疫情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是一场全民的英勇行动，也是一场离不开儒家文化影响的科学战役。儒家具有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是其经典的表述。实事求是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明清实学派儒家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返本开新，激励人们消除愚昧思想，寻求真理和创新，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毛泽东扬弃发展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传统儒家文化观点。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解释，并把它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近百年的党的发展史，可谓是党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战胜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并贯彻到中国革命、社会

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方面的历史。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常战役中，我们秉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把遵循科学规律贯穿到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我们在“尊重规律，战胜病毒”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具有民族自信的一系列做法，充分展现了具有英雄底色的中国人民“人定胜天”的传统斗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四、仁爱大同的和谐思想
儒家学说追求普遍的和谐，即在全社会里，要达到人同自然、社会的共同发展和辩证统一，同时还包括人彼此间的和谐，如“仁者爱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天下大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刻地体现了这种极具中国气派的终极人文关怀理念。“仁者爱人”是君子最高的德行，“礼之用，和为贵”，要以和为贵，友善待人，和睦邻友好，善中友外，体现了中国人对和谐友爱大同社会的向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万物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引用了这句话和“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诗

句。不同地理环境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不同的文明，这些文明交相辉映、互补共生，呈现出万千春色。儒家文化这种重和去同、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内在气蕴。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我们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号召一起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以实际行动帮助挽救了全球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体现了中华民族“仁者爱人”的传统，彰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尽显大国风范。

习近平总书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文明从未出现断层，在优秀文化的滋养下，中华民族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敢于迎难而上。抗疫精神，亮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价值观，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底蕴的影响。儒家文化中具有诸多优秀的成分，这些长期延续的优秀因素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深入挖掘抗疫精神背后的儒家文化底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构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城”，凝聚起中国精神的磅礴伟力，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郝良华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曲晓萌系山东济宁卫生学校讲师，本文系济宁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儒家传统价值观的传承转化及超越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在学习“四史”中谱写“四史”新篇章

□ 江海玉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回信中指出：“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在“四史”学习中让初心薪火相传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注重从历史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必修课。重温“四史”，深刻感悟党在不同阶段的艰苦奋斗历程，可以更深层次地思考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信仰，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四史”的历史演进过程，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深刻地阐释了我们现在所走的道路、我们所坚信的信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抉择。认清和把握这一历史逻辑，才能真正做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培植共产党员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才能切实做到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二、在“四史”学习中明大势，树立正确的历史思维，坚定“四个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将“四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学习，可以充分激活承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阔视野，把40余年的改革开放史置于新中国70余年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学习，把70余年的新中国史置于百年党的奋斗历程中学习，把百年党史置于50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学习。通过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的学习思考，夯实“四史”基础知识，构建逻辑严密的“四史”知识结构，全面掌握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前世今生及其发展方向，做到“知其

然更知其所以然”，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大道、历史大势，才能深刻认识到为什么中国要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深切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在波折中发展的艰辛。“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学会和树立正确的历史思维、培养历史视野，才能树立正确、廓清思想上的历史迷雾。深刻认识前些年甚嚣尘上的虚无主义的政治危害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才能全面、辩证地看待历史现象、历史问题，才能正确地看待历史失误、挫折，做到政治清醒、道路自信。应当看到，近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的历史文化素养、历史思维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历史博大精深，学习永无止境，从以往的学习情况看，对标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在历史学习上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需要在深化“四史”学习中加以克服。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了现实的道路和未来的方向。今天，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之中，更需要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科学分析，形成正确的历史思维，以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三、在“四史”学习中汲取精神力量，时刻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支撑。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华民族百年复兴之路的拓展，其前进征程中无不充满着未知、荆棘，只有靠坚定的斗争精神方能砥砺前行，才能开新运、拓荒路。“四史”的书写，是一辈辈共产党人为革命为建设挥洒青春热血的感动天地的事迹接力完成的。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党涌现出了众多极具感召力的榜样标杆、优秀典范。这些在不同时期被点赞的榜样楷模，是共产党人红色基因的形象再现，是共产党人精神图谱的具体表现，展现了一幅幅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画卷。这些不同时期的党员标杆，为我们标出差距，为我们指明了人生奋斗和前进的方向；一代代共产党人可歌可泣的动人

事迹，如同一面面明镜，“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助我们荡涤灵魂、升华境界。“四史”中一代代共产党人谱写的感人诗篇和无处不在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人们开拓前进、奋勇前行，激励着人们牢记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永葆奋斗激情，永践初心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机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担当，“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面对国际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更需要我们弘扬老一輩的奋斗精神，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抓住机遇，把本职工作作为主战场，在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在“四史”学习中继续谱写“四史”新篇章

以史为师，学以致用。学知在于用，思信在于行。党员干部修好“四史”必修课，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我们要把“四史”学习教育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要将“四史”学习成果转化成为动力，不断提高担当作为的能力和自觉。既要学懂弄通的排头兵，又要当善作善成的实干家，把实践作为衡量“四史”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以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的韧劲投入到党的各项事业中去。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汲取经验智慧、汲取坚守人民立场的定力，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好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更好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刚刚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我们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对二〇三五年目标、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作为党员干部，责任更为重大，有很多硬骨头需要我们去啃，许多目标、任务需要我们去完成。让我们从“四史”学习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不移推动当代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走向伟大复兴，谱写出“四史”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党校副校长、高级讲师〕

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战略家，特别注重并且擅于总结历史以汲取开拓前行的力量。在延安整风时期，他为中共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明确了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探讨了党史研究的立场态度，分析了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党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学习研究党史的锐利武器。

一、全面的研究

为了推动延安整风，需要对党的历史进行总结，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考虑过”。为此，毛泽东强调，“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由于战争年代党的历史文献多有遗失，从1941年秋开始，毛泽东投入大量心血，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等三部大型历史文献，作为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历史经验、研究党的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文献并非还原党所经历的每一件事，而是注重对党的路线政策进行系统梳理，促使感性认识升华至理性判断，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毛泽东在强调全面研究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具体问题，提出要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毛泽东的这一主张，于整体中把握脉络，于具体中总结规律，将整体与具体有机融合，体现了全面、辩证的历史观。

二、古今中外法

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又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即弄清楚问题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把问题作为发展的、相互联系的过程去分析，研究主要方面，探寻趋势规律。对于“古今法”，毛泽东解释为“就是历史的发展”，即按照时间轴进行纵向观照。他将这种方法运用于党史研究，构建了党史分期体系。以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斗争目标（革命的任务）、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统一战线所联合的群众）为衡量标准，将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921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其中1921年至1924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阶段；1928年至1937年的内战时期；1937年以来的抗日时期。虽然毛泽东谦虚地说：“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但是，毛泽东对党史的阶段划分及其对各阶段的

历史特征分析获得了史学界的承认，得到了全党认可，并一直沿用至今，滋养教育了几代人。毛泽东还强调，“古今法”不仅要考察党成立后的历史，还要考察党成立前准备阶段的情况，不如此就不能更好地理解党成立后的种种情况。他提出，研究党史应该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说起，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对党的诞生和大革命所起的推动作用，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深邃的历史视野。

对于“中外法”，毛泽东解释到“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属于同一个时段上的横向比较。当然，毛泽东的“中外法”是广义的、相对的。比如，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外的情况弄清楚，对于中国自己的情况也就不容易弄明白。比如要研究清楚辛亥革命，就不能不研究当时国内国际的形势，不能不研究晚清王朝的诏书和袁世凯政府的文件。要研究清楚内战时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就不能不研究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他们两者如何压榨人民。他说，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后依然坚持打共产党的情形弄清楚，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就没有道理和根据。因此，他号召将来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一种是党外的，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马恩列斯已经讲过”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

三、客观科学的态度

毛泽东强调，研究党史要秉持科学的态度，努力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左”的或“右”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对这些错误的分析应该首先看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而不能仅仅归罪于个人主观因素。他说“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作的”，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观，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泥潭。同时毛泽东也注意到革命领袖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指出“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对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一分为二、客观公允的评价。比如报告提到陈独秀时，既指出了他的路线错误要不得，又肯定了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修中国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2019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发表《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评价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

毛泽东是如何研究党史的

□ 张朋

等，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进行历史判断的客观公正。为了更加客观科学的研究党史，毛泽东指出需要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各种情况，但是他特别强调，必须把这种研究和党史研究的关系弄清楚，“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他指出，要把指导思想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研究中国特点，适应中国需求，反对教条主义、照抄照搬。毛泽东尤其反对那些崇洋媚外、以洋为尊、言必称希腊，甘做外国留声机的做法。对中国立场的站定，体现了毛泽东强大的理论自信和思想自觉。

毛泽东主张用整体的、全局的、辩证的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强调把握主线、主流、本质和规律，开创了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先河。今天重温这篇报告，对于我们更好地学党史、用党史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作者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